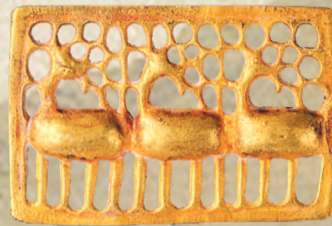




金爵(明)



银杯(唐)



金牌饰(东汉)

物华天宝 器以载道

——跨越千年的中国出土金银器

每一件出土的金银器，都是历史的缩影，既记录着人类对财富的追求、对美的向往，也见证着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中国出土的各类金银器，跨越数千年时光，见证了不同朝代的经济发展、工艺进步、审美变迁与文化交融，是解读古代社会风貌的重要实物资料。基于出土金银器实物及相关铭文信息，从神秘的财富属性、时尚的奢华象征、多元的交流融合三个维度，结合不同时期典型器物，可以很好地梳理中国出土金银器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内涵。

据《北京晚报》

金银天然是货币

中国古代金银器称重单位随朝代更迭逐步调整，形成清晰的发展脉络。战国时期，称重单位以“斤、两、铢(朱)”为主，唐以后，逐渐细化为“斤、两、钱、分、厘”，同时出现“角”等辅助单位，计量精度进一步提升。宋元明清延续唐以来的体系，部分器物还出现特殊计量标注。

在材质成色标注上，不同时期铭文呈现出多样表述。部分器物标注商号、工匠信息。宫廷制作的金银器则多标注官方机构与负责人，体现宫廷器物的制作规范与管理体系。这些既反映了古代对金银纯度的精准掌控，也体现了古代金银器生产的规范与责任体系。此外，部分铭文还标注器物用途。比如，四川彭州南宋窖藏高圈足银熏炉底座，内底即镌铭“香奁一座重柒拾两”。

除日常使用与流通外，金银器在进奉、馈赠等特殊场景中，更凸显其财富价值与社会功能，成为权力博弈、人情往来的重要媒介。进奉的器物多体量较大、工艺精湛，价值远超普通金银器，目的是邀恩取宠、谋求晋升。西安北郊坑底寨出土的唐代双凤纹大银盘，直径84厘米，重2850克，盘底铭文标注进奉者为“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裴肃”，其重量相当于九品官七八年的俸禄，加之制作工本，价值极为贵重。《旧唐书》记载，齐映为复入朝廷任用，特意制作高八尺的银瓶在皇帝诞日端午进献，此前，江西观察使李兼曾进献六尺银瓶，足见进奉金银器的规模与价值随竞争不断升级，成为官场权力运作的重要工具，这类进奉器物不入国库，直接进皇室支配的琼林、大盈二库，进一步强化了皇室对金银财富的掌控。



金兽(战国至汉)

流动与融合

中国的出土金银器并非孤立发展的产物，而是在与外来文明的交流融合中不断丰富。既吸收异域的工艺与造型元素，又融入本土特色，经过改造创新形成独特的风格，成为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的重要见证。

西汉时期，中外金银器交流已初现端倪，西域的工艺与造型元素开始融入，最典型的代表是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银盒。该银盒造型与工艺具有明显的异域风格，与伊朗国家博物馆藏的阿契美尼德王朝薛西斯一世金碗、弗利尔美术馆藏的阿塔薛西斯一世银碗造型相似，均采用锤揲工艺打造圆形器身，纹饰布局对称，这类风格被西方学者称为“阿契美尼德国际风格”。西汉齐王刘襄墓陪葬坑、江苏西汉刘非墓等也出土类似风格的金银器，印证了早期中外金银器的交流，推测这类器物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或由中国工匠借鉴异域风格制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早期实物证据。

北魏时期，随着民族融合加剧与丝绸之路的繁荣，外来金银器风格的借鉴更为深入。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的金银器，融合波斯、粟特等异域文化元素，器型与纹样突破传统，呈现多元融合特征。同期，中国金银器的工艺与风格也开始向外传播，形成双向交流格局，为后续文化融合奠定基础。

高足杯就是中外文化融合的典型器物，其造型源于古罗马，经西域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结合，

形成兼具异域特色与中国风格的器物类型，广泛流行于北齐至明清。古罗马银制高足杯是原始形态，杯身与高足分离又紧密连接，造型简洁实用。北齐武平五年河北临城李氏墓出土的高足杯、河南安阳相州窑出土的青釉乳钉纹高足杯，借鉴高足造型，纹饰采用本土乳钉纹，开启高足杯中国化改造的先河；唐代以后，高足杯进一步融入中国纹样，岳州窑褐釉印花高足杯，以褐釉印花工艺装饰本土花卉纹样，完全适配中国审美需求。宋元明清时期，高足杯的中国化改造更为彻底，成为本土主流器物之一。江苏省金坛尧塘西榭村窖藏宋代银杯，高足设计延续异域痕迹，内外壁装饰花卉、凤凰等中国传统图案，足部中部阳刻环形一周，纹饰延伸到底部，造型与纹样完美融合；明代榆中县高崖镇金杯高足造型与本土吉祥纹样结合，完全褪去异域痕迹，成为中国传统金银器的经典器型，展现了外来器物在中国的本土化创新历程。

中国出土的金银器，跨越战国至明清数千年历史，承载着多元的文化内涵。每一件出土的金银器，都是历史的缩影，既记录着人类对财富的追求、对美的向往，也见证着文明的碰撞与融合。通过解读这些金银器背后的历史信息，我们能更清晰地梳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多元魅力，为当代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重要借鉴。

云鬓花颜金步摇

金银器的时尚属性，体现在器型、纹样、工艺的不断创新与演变中。从礼器仿用到日常装饰，从自然纹样到吉祥如意，成为古代社会时尚潮流的直观反映。宋代是仿古金银器的鼎盛时期，既传承青铜礼器的庄重气质，又凸显金银的奢华质感，满足文人雅士对古风的追捧与审美需求。随着生活方式的变迁，金银器逐渐走向日常实用，贴合生活场景的同时引领时尚潮流。用品方面，宋代出现莲花形银碗、梅花形银盏，元代有菊瓣形金盏、银盘，明代有高足金杯等，造型灵动，适配不同饮食需求；饰品方面则以步摇、簪、梳等为主。

唐代金梳盛行，王建《宫词》有云：“玉蝉金雀三层插，翠髻高丛绿鬓虚。舞处春风吹落地，归来别赐一头梳”，即生动描绘了这一场景。在明代，纽扣则成为金银器的重要品类，江西明益宣王墓出土的金扣花、明定陵出土的嵌宝“卍”字灵芝金纽扣、“福”字宝相花纽扣，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民歌《挂枝儿》中“纽扣儿，凑就的姻缘好。你搭上我，我搭上你，两下搂得坚牢”，使其成为时尚与情感的双重载体。清代则流行金指甲套，贵族女性以其彰显身份与品位。

金银器的纹样设计始终紧跟时代审美，从传统几何纹到自然纹样，再到吉祥如意纹样，不断丰富。自然纹样中莲花、菊花、梅花等尤为突出，各朝代赋予其不同内涵。莲花纹样因“超凡脱俗、出淤泥而不染”的寓意备受青睐，四川彭州南宋莲花纹银杯、浙江湖州南宋莲花形银碗以莲花为造型或核心纹样，尽显清新雅致；菊花纹样象征“凌寒飘香、气节坚强”，湖南省临澧县元代菊瓣形金盏将菊花形态融入器型，传递坚韧品格的寓意；梅花纹样则因“欲传春信息，不怕雪埋藏”“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的精神内涵，成为宋元明清的时尚，南京南宋张同之夫人章氏墓银盘，整体呈五瓣梅花形，盘内满饰细云纹地，压印折枝梅花、弯月与流云，梅花上篆刻花蕊细节，融合水、月、梅的意象，契合宋代诗词咏梅范式，将自然之美与文人情怀完美结合。除花卉外，动物与吉祥寓意纹样也不断创新。明代榆中县高崖镇金杯，口沿外及足面戳刺卷草纹，杯底篆刻仰莲瓣，卷草纹的连绵不绝象征生生不息；元代无锡钱裕夫妇墓金杯，杯心中央篆刻“莲生贵子”图案，将花卉纹样与吉祥寓意结合；明定陵出土的嵌宝“卍”字灵芝金纽扣，“卍”字与灵芝均为吉祥符号，传递祈福纳祥的美好愿望，这类纹样既符合大众审美需求，又推动时尚潮流的传播。

金银器锤揲、鎏金、扭丝、镶嵌等工艺的应用，既展现技术实力，又赋予器物独特的视觉效果与触感。锤揲能将金银片打造出立体灵动的造型，鎏金则能提升器物的奢华感。它们既推动金银器制作技术的进步，又赋予器物独特的质感，使其成为不同朝代奢华生活的直观象征。